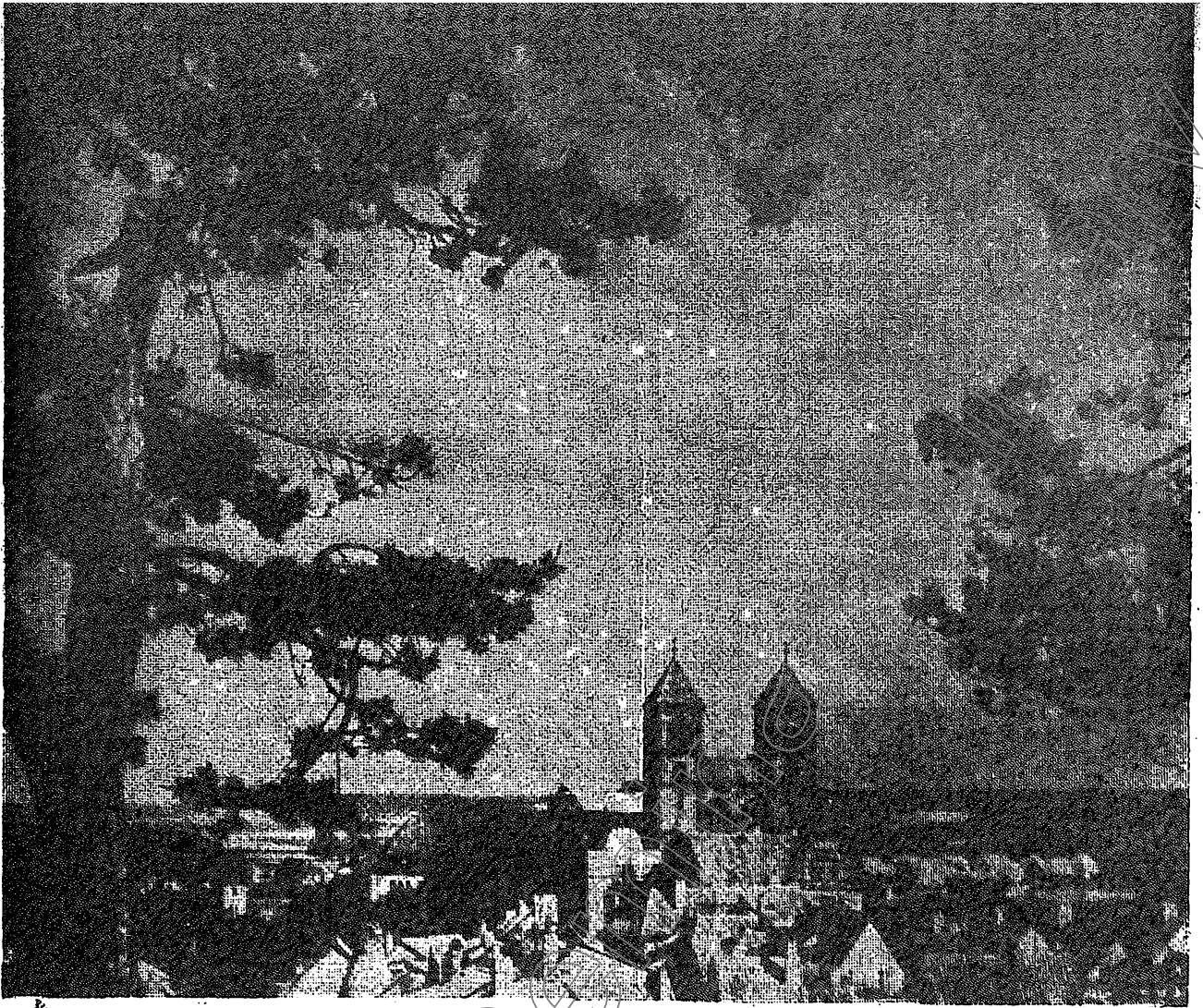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22**  
1957



德國奎林堡主教座堂遠眺

Holy Spirit

封面：德國邦堡的主教座堂



## 1957 年第 22 期 (總第 151 期) 目錄

半月談：独立自主办好教会.....	( 2 )
中国天主教会必須在政治上与經濟上和 羅馬教廷割断一切联系.....	李 毅 ( 6 )
正确認識与教廷关系的問題.....	孙峻德 ( 14 )
略談独立自主的問題.....	王洗耳 ( 18 )
对社会主义学习的一点体会.....	王师德 ( 20 )
講道台：該怎样过將临圣时.....	李德培 ( 24 )
貫徹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学习	
湖北省傳達学习會議正式開幕.....	( 27 )
湖南神长教友駁斥張懋的反动言行.....	( 28 )
貴州省天主教人士座談会胜利結束.....	( 30 )
各地傳達簡訊.....	( 32 )
金萃菓.....	( 33 )
教廷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阴謀破坏活动	
(上).....	本刊資料室 ( 35 )
耶穌傳.....	李德培 ( 39 )

<b>廣 播</b> (半月刊)	1957年第22期(总第151期)	
	1957年12月12日出版	
	定價：每冊1角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 个月 6 期 0.60 元
	爱国运动促进会	6 个月 12 期 1.20 元
	(天津市新华区西宁道9号)	1 年 24 期 2.40 元
印 刷 者	天津联合印刷厂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区复兴道90号)	(国外及挂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整付登記許可証第40号		



## 獨立自主辦好教會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指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須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帶給我們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違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这一決議揭示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应走的道路，給全国神长教友明确了今后努力的目标，因此得到全国广大神长教友的衷心拥护。

为什么在以成立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为主要目的的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要討論到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主的問題呢？这是因为，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主的問題，不單純是教会本身的問題，而是一个牽涉到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的政治性問題。中国天主教会是否独立自主，关系着国家的独立与尊严；換句話說，如果中国天主教会不实行独立自主，还处于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帶給我們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任凭帝国主义利用教会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我們国家的独立必將受到損害；事实証明，自解放以来帝国主义仍然处心积虑地迫使中国三百万教友与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分裂出来。这是已經躋于世界大

国之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六亿人民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也是所有爱国爱教的中国神长教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因此，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为了保证教会不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中国教会必须实行独立自主。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有人认为，暗藏在中国教会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肃清了，广大的神长教友的政治觉悟已经空前地提高了，这样就已经可以保证教会不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了，似乎不必提什么独立自主。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上所揭露的教廷利用宗教形式干涉中国内政的事实证明，教廷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中国教会来破坏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企图，尤其是对中国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更是百般蓄谋破坏。教廷无理否认上海教区合法选出的张士琅代理主教的职权，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同时残存的反革命分子也仍然企图钻进教会里来伺机活动，我们教会也还有那么一小撮甘心效忠于帝国主义的反动分子，从这次传达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学习中也暴露出这样一些分子。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如果不实行独立自主，就仍然难免使教会沦为教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工具，而使祖国与人民的利益蒙受损失。

实行独立自主，并不违背至一、至圣、至公的圣教会传统。独立自主地办理教会并不是一件什么新事，而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史许多史实告诉我们，宗徒领圣神后便往各处传扬圣教，只要那个地区有了相当的教友，他们就从这些教友中，选出一个有学识、孚众望的人，圣为主教，叫他负责管理那个地区的教务。对于这个问题，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他那有名的“夫至大通牒”中更作了明确的阐述。他说：“天主圣教既

属至公，公則无一国民，无一邦族，可目为外来之客教。”这就是說，要使圣教会成为各国人民自己的教会。他又說：“凡本籍鐸曹治理頗敷，学术頗优，而于本位圣召亦足以相称，然后人謂其地傳教之功业，已庆告成，教会之根基已然确定，是乃理所至当。”这就是說，使各国自己的神长有了治理各国教会的能力，才能說是傳教事业成功了，教会的根基确定了，也就是达到了吾主耶穌遣徒訓众的目的。于此可見，独立自主于圣教会的傳統精神毫不相悖。我們再从教会历史上来看，各独立国家的教会，没有一个不曾享受过独立自主的权利的。即以主教的选择与任命为例：法国和一些南美的国家，就曾与教廷訂立过协定，在教廷选任主教时，須經各該国政府同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地利、巴伐利亞、西班牙、葡萄牙与秘魯等国，主教候选人名單更由各該国的政府向教廷提出。今天在英美等国，主教候选人由出缺教区的諮議會提出三人，呈报教廷选择任命。这些事实都說明，尽管教宗对各地教会有最高管理权，但他在行使这项管理权时，必須充分考虑到当地教会（有时甚至是政府）的意見，而不應抹杀各地教会应享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是对于中国的教会，虽然在1946年即由教廷宣布实行了圣統制，而教廷却仍然視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教会一样，任意干涉中国教会的行政，甚至为了达到它的不可告人的反动政治目的，竟对上海教区做出史无前例的分散神权的荒謬决定，不惜以上海教区十多万教友的灵魂为代价，來换取帝国主义国家的欢心。这里，也正好說明了独立自主的問題是一个政治性質的問題。

應該指出，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中所提出的中国天

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不能与裂教或脱离教宗混为一谈。任何人在这方面的杞忧都是荒唐的。決議清楚地指出，中国教会“在不違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这是中国天主教会不脱离教宗、不裂教的明証。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就已經尽到了我們作为基督肢体之一的全部責任。任何人沒有权利要求我們在这以外再对教廷承担什么政治或其它宗教范围以外的义务。中国的教会是普天下圣教会的一部分，因而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必須服从教宗；同时，中国的教会是由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中国神长教友組成的，因而有义务維護祖国的利益和独立尊严，在純宗教問題以外的其他事务上，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办事。这是天經地义、理所当然的，沒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地方。有些別有用心的人，在这一点上大做其文章，意圖以此挑撥認識不清的教友与政府对立和誣蔑爱国运动。这是我們坚决不容許的。

中国天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是一条既有利于祖国和人民又有利于教会前途的光明大道，是全中国三百万神长教友共同努力的方向。我們相信，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領導，有全国六亿人民的支持，有全国神长教友团結一致的爱国爱教的决心，我們一定能够彻底摆脱过去中国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使中国圣教会象所有独立国家的教会一样，享受到应享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使中国教会的地位与我們的偉大的祖国的地位相称，使中国的教会不仅完成事主救灵的神圣事业，而且成为政治上是热爱祖国的好教会，使帝国主义一切利用中国天主教会的阴謀詭計化为泡影！

# 中國天主教會必須在政治上與經濟上和羅馬教廷割斷一切聯系

長沙教區神父 李 毅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最後指出：為了祖國的利益，為了教會的前途，中國天主教會必須徹底割斷政治上、經濟上和羅馬教廷的關係。今僅就這個問題發表一點我個人的意見，請讀者指正。

耶穌在聖經上教導我們說：“責撒肋的歸責撒肋，天主的歸天主。”由此可見，政治與宗教、國家與教會的界限，是劃分得很清楚的。按照天主的聖意，教會的首領是只應該領導教徒靈魂上的神聖事業的。歷來的教宗，在教義的闡述、福音的傳播等宗教事業上確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績；但，不可諱言，近世紀來，以教宗為首的羅馬教廷却大大越出了它應有的宗教職權範圍。

基督的國是神國，而教廷却在羅馬建立了一個有形的梵蒂岡王國。教會首領不應該建立有形的王國，這我們暫且不去管它。但作為一個國家來講，梵蒂岡在政治上

却是極端反動的。過去和現在總有一些人企圖顛倒是非說它是“超階級”的，是“恥于”政治鬥爭與政治利益的，硬說它所關懷的只是宗教、道德和全人類的福利。顯然，事實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知道，世界已分為兩大陣營。號稱“職業的政治家”的當今教宗比約十二世也承認世界已分為兩大陣營，但他却瞞騙信徒們關於世界分成兩大陣營的道理。他認蟻民主陣營，盡量為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開脫罪責。教宗在1948年6月2日的一篇演說中說：在地球上，“善與惡”、“安寧與混亂”互相對立着。他誑稱新戰爭挑撥者陣營，即資產階級、地主、法西斯匪徒、戰犯的反動陣營是“善”與“安寧”的陣營，而把勞動者陣營，即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認蟻為“混亂”與“惡”的陣營。教宗的這篇演說又一次證明他正處心積慮企圖對自己的信徒隱瞞世界上兩大陣營的真

实性，以使用宗教的花言巧語来掩飾和辯护反动陣营的計劃。

按照神学的道理，任何国家組織形式都是教会可以接受的。教宗比約11世与比約12世曾不只一次地假惺惺地声明过，国家組織形式对他們是无关痛痒的，也就是說任何一种国家組織形式都是可以接受的。比約11世在1933年6月3日的通諭中写道：有一件事实是人所同知的：“就是天主教会向来未曾因某一种政体能保障神权与基督教信仰就与它联系多些，而与其他的就联系少些，它并不感到要适应各种各样的民政机关会有什么困难，不管它是君主制也好，共和制也好，貴族制也好，或者民主制也好。”这完全是一片自欺欺人的謊言，教廷直到現在也沒有放弃它在許多欧洲国家內复辟君主政体的企圖。去年匈牙利的十月的反革命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匈牙利十月事件自1956年10月24开始至11月4日匈牙利工农政府成立止，为期不过十天，在这短短十天的日子里，教宗却感到万分緊張，一連发出了三道通諭。11月1日发出的第二道通諭就是支持匈牙利叛国犯明曾帶紅衣天主教的企圖使霍尔蒂王朝統治复辟

的阴謀的。

良13世是第一个向资产阶级共和国靠攏的教宗。他在1888年6月22日的通諭中，闡述了教会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及君主制度的态度。他既贊成前者也贊成后者，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与君主制度兩者都是剝削階級的統治形式。

1941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愈趋猛烈的时候，很多信徒曾希望我們的圣父（教宗）会主持公道出面譴責法西斯强盜，然而他們这些希望都成为泡影，梵蒂岡机关报“羅馬观察报”不但不會責备过战争贩子半句，反而多次声明說“国家形式对天主教会是无关痛痒的”。当时法西斯德国正在使欧洲被占領的各国血流成河，在希特勒枷鎖下輾轉呻吟的千百万人民当中，也正有着波蘭、比利时、法国及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在集中营中受希特勒劊子手折磨的人們当中，也正有着天主教的神父。可是当时天主教的首腦却声明他是“中立”的，說是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与民主制度同样都是好的。这个声明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教廷宁願与“軸心”国集团合作，并且曾在战时多方帮助了这个集团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包括天主教徒在内）都纷纷要求给战争贩子们以应有的惩罚，但教廷却出面要求给以“人道”的待遇。

教廷在过去和现在始终都和最反动的政府保持着最亲善的关系。1931年12月，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强迫高等学校的教员举行为法西斯制度尽忠的宣誓，当时有一部分天主教的教授表示犹豫不决，而教廷却出面协助墨索里尼。

德国建立法西斯独裁后几个月，梵蒂冈就同希特勒政府签订条约。这是希特勒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比约12世在1939年4月16日在祝贺佛朗哥推翻西班牙共和国的贺电中，把法西斯杀人犯叫做“基督教的英雄”，叫做“宗教与基督教文明的卫护者”，他特别称赞佛朗哥及其心腹同僚。斯洛伐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建立傀儡政府之后，比约12世立即授予该国元首——天主教神父蒂索以御前侍卫的称号，并将其擢升为主教。法国贝当叛国后三星期，教宗马上号召法国的天主教徒起来支持维琪政府。他同奥地利天主教法西斯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政府也都保持过最友好的关

系。这一切都是教廷与法西斯匪帮亲善的彰明较著的实例。

有一些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拼命为教廷辩护，硬说教宗所坚持的“原则”是与法西斯不相调和的。当然，天主教的教义与法西斯是不调和的，但是教廷与法西斯意大利及法西斯德国历来的关系，以及现在与法西斯佛朗哥及其他国家的亲法西斯分子的友谊，都证明教廷的“原则”是完全与法西斯相调和的。

教廷已紧密地同法西斯匪帮结为一体，法西斯匪帮被击溃之后，梵蒂冈就成了法西斯残余的避难所、支柱和希望。

1943年，当意大利战败前不久，教宗曾提出一旦墨索里尼被打倒即用以保全法西斯国家机构的计划。他打算借斯塔尔曼、邱吉尔以及美国统治集团的力量来实现这个计划。

美国对教廷战后的全部活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教廷在现在一切根本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完全符合美帝国主义的方针。教宗无条件地拥护美帝国主义奴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罗马观察报”写道：“我们信任马歇尔计划”，又

說，馬歇爾計劃“因其內在的真理而光芒四射”，并說：“懷有成見是沒有理由的，認為馬歇爾計劃里原有想做霸主的願望是不合理的”。教廷擁護“杜魯門主義”，也擁護并稱頌北大西洋公約這個美國所組織的旨在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軍事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簽字以前，教宗在1949年1月12日的文告里說：“對於這個用最密切的聯繫把各國團結為一個聯盟的倡議，我們歡迎并贊成地歡呼。”

教廷支持美國建立“遠東聯盟”的計劃。在近東方面，美帝國主義者也正廣泛地利用梵蒂岡的關係、組織和支持。教廷在南美也充當着美帝國主義者的幫兇。美國主教萊陽在1940年5月寫道，梵蒂岡與很多國家特別是南美各國的統治集團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梵蒂岡——萊陽繼續寫道——是世界上最靈通的一個組織，它擁有數以千計的訓練有素的官方的與非官方人物，特別是外交家，在為自己服務，為自己蒐集情報；這樣，它就擁有世界上最完備的情報機構了。萊陽主教在他所寫的文章結束語中說道，美國要想為自己的利益來利用這個機構，唯一的辦法就是和教

廷建立外交關係。他還厚顏無恥地說，凡是在加強與梵蒂岡聯繫的一切國家，所追求的就是政治目的而不是宗教目的。“如果以為德國、法國以及英國承認梵蒂岡是出自崇高的基督教慈悲心，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它們如果有所給予的話，那它們也一定是希望有所得的。”

教廷對帝國主義陣營法西斯國家所持的反動立場如此堅定，所抱的態度如此親善，可是它對以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國家所採取的則是一種完全相反的的極端敵對的立場。在這種場合，“一切政權真是天賦的”這句話已經被教宗遺忘了。從1917年起，直到今天，教廷從未停止過反蘇的活動，過去和現在，一切國際反動勢力的反蘇陰謀都有它一部分。教廷如何仇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產生的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其他人民民主國家，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可見近代教宗們所謂對任何一種國家形式都抱“同一態度”、“一視同仁”的宣言，不過是一句謊言而已。教廷所擁護的只是那種由剝削者統治的國家，所仇視的是由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

教廷之所以這樣猖狂地反對以

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国家，主要是由于它的剥削经济所决定，但与它的极端仇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仇视共产主义也是分不开的。

近百年来，教宗们的重要谈话没有一篇不包含诬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谰言。远在1846年，比约9世就曾宣称共产主义“是与自然法权相对立的”，后来在1864年的“异说提要”上，他又提起他曾在1846、1849、1854、及1863这几年中所发布的通谕中“以强有力的词句”谴责了共产主义。

教宗良13世与比约10世，也在很多通牒中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本笃15世在1914年11月1日不去谴责当时把人类引向世界大战深渊去的帝国主义，反而去诋毁社会主义。诋毁共产主义最厉害的要算比约11世。1937年3月19日，他特别发表了“论无神的共产主义通牒”，在其序言中，他列举为过去自己数十次的反共言论，并强调说他是“经常地并且始终不渝地”这样做的。现任教宗比约12世仍继续奉行其先辈们仇视民主与共产主义的政策。在战时，当全世界人民都在进行反法西斯匪帮的残酷斗争，而法西斯强盗则在烧杀、绞杀千百万

的人类（其中包括天主教徒与神父）的时候，他起来反对的却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1942年圣诞节，他声明：“始终为宗教的动机所鼓舞的教会，曾谴责了各种形式的马克思社会主义，现在也还在谴责它们。”这个声明是直接针对着那些在欧洲被占领国家内与法西斯匪帮进行斗争的英勇战士，同时也是针对着当时肩负着与法西斯侵略者作战的一切重担的苏维埃国家而发的。

教廷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卫兵，是法西斯匪帮的同盟者，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敌人，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仇视者，在政治的基础——经济上自然也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辩护者，与剥削阶级统治的拥护者了。

世间的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天主教的教义也告诉我们，天主造的万物是为广大人民享用的。当人民大众愈普遍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资本家的统治愈受到威胁时，执行资本家意志的教廷就愈关心所有制的问题。1891年良13世在“新事故”通牒中宣称：人的私有权是“天赋的”，人，据他断言，其所以异于禽兽，就是因

为他拥有私有财产。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大多数人是沒有财产的，甚至是沒有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那里财产是集中在一小撮銀行家、工业家以及地主的手里，例如在美国，六十家大財閥就是美国真正的主人、真正的政府。

1931年，为了紀念良13“新事故”通牒頒布40周年，比約11世，仿效良13世的先例，在“第四十年”通牒中，又一次肯定地說，天主教会認为資本家的私有财产是“天主的恩賜”。比約11世承認他的关于所有制的見解是反社会主义的。“天賦的私有财产”，他写道：“必然是永固不破的。”为保护資本家与地主的利益，比約11世指責所謂“工人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說，指責那些对于自己的奴隶地位感到不滿而起来为美好的生活奋斗的人們。

当今教宗比約12世，也以同样的精神維護着百万富翁的財富。在1939年11月1日致美国神职界的一函中，比約12世写道：“高高在上支配着我們命运的天主，規定世間富人与穷人并存，是为了更好地考驗我們为人的品格。”

教廷坚决反对生产資料与生产

工具社会化，反对消灭剝削阶级和阶级間的不平等，它对人民宣揚讚頌安貧的好处。比約12世在1939年11月致美国神职界的信中写道：“穷人在天主那里占有榮譽的地位，天主已应許他們进天国，他們比別人容易得到深厚的超自然的恩寵。”

但是以教宗为首的教廷本身是否向往那“理想的安貧之道”，是否蔑視現世荣华而只期望着“超自然的恩寵”呢？

在中世紀的欧洲，天主教会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封建領地是天主教会的主要财产。

在资本主义时代，梵蒂岡日益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組織，現在它一方面已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它在欧洲許多国家中照旧还跟封建集团保持着联系，照旧还拥有大量的土地。

如果說教廷在中世紀“把神賜的圣光加于封建制度之上”，那么，現在它則用神賜的圣光加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上了。

梵蒂岡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资本主义組織，它在物質和政治的利害关系上都是和剝削工人、投机倒把、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战争分不开的。

梵蒂岡从哪里来这么多钱呢？这个问题，很难答复，因为梵蒂岡并不公布它的预算，甚至教宗的亲信也摸不清楚梵蒂岡的财政状况，教宗国库的收入是保持极端秘密的，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在报纸上已流露出的片断材料来判断。

梵蒂岡的资本是庞大的，它通过一些有爵位的世俗人或神职人员在意大利就控制着三十几家股份公司，其票面资本不下3亿战前里拉，它的资金投遍于意大利所有的工业部门，梵蒂岡在这些企业内的财产据估计达25000万战前里拉，梵蒂岡及其修会在意大利拥有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广大的土地，据大约的估计，这些不动产可值3800亿里拉，梵蒂岡在意大利控制的银行不下150家。

梵蒂岡在法国各工业部门也有投资，特别是纺织部门，据估计，梵蒂岡在法国股份公司方面拥有资本达两亿法郎。

梵蒂岡在南美各国也拥有大量的财富，在阿根廷它握有经营电车业的公司和供应电力、煤气及自来水公司的股金；它参加经营轮船公司，控制很多的地方银行；在玻利维亚，它拥有锡矿，还参加各国开

采铜矿与石油的企业。据不完全的统计，梵蒂岡握有各国股票竟达数十亿美元之多，这些资本是投在军事工业、石油公司、公共事业与保险公司等方面的。此外梵蒂岡还和国际军火投机商人巴济尔·扎哈洛夫的继承人共同控制着法国的比里利芝、维希和摩纳哥的蒙特卡罗的赌场，可见梵蒂岡的投资是从来也不考虑到企业的道德性质如何的，不管军事工业也好，赌场也好，只要有利益可图，什么都行。

梵蒂岡来自美国的收入那就更多了，据报载，梵蒂岡80%的收入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

说梵蒂岡的收入完全来自世界各国天主教徒的献仪，是与事实不符的。

目前梵蒂岡的黄金储藏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占世界第二位。

法国“水平”杂志写道：梵蒂岡拥有“不知其数的财富”，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的企业主”。梵蒂岡要有这么多的财富干什么？它真的是尽用之于宗教事业上吗？美国学者戴维斯说道：梵蒂岡的资金只有极少的一部分是用于慈善事业上的，但另一方面，它在反民主的宣传上都是不惜用钱的，

仅用于反苏反共的，每年就达25,000万元。

正如在政治上梵蒂冈已不仅是为帝国主义所包围、所利用而是与它们结为一体的，同样在经济上，梵蒂冈也不仅已成为大资本的附庸，而是成为大资本的组成部分了。

近世纪来，梵蒂冈和我们中国人民只有敌对的历史，而没有丝毫友好的表示。它承认过伪满洲国，抗日时期，它要我们中国人民严守“中立”，直到现在，它仍然还派遣被中国人民驱逐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驻在台湾与蒋介石卖国集团相勾结，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中国的天主教徒是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在政治上，教廷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认清、揭露并警惕教廷利用宗教而进行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破坏阴谋活动，因为在政治上我们不能作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在经济上我们也必须认清梵蒂冈资金的来龙去脉。梵蒂冈的经费来源既不光明，用之亦不正当，中国的天主教会要这种不义之财干什么？我们相信，同中国人民一道站立起来了的中国天主教徒，不要梵蒂冈的经费，是有力量办好自己的教会的。

在政治上与经济上完全和教廷割断一切联系，这是中国天主教会应该采取的立场，也只有这样，才有它的前途。

## 更正啓事

我在“广扬”本年第19期发表的“比约11世与法西斯意大利”一文中，误将教宗比约12世在1943年6月13日向25,000意大利工人发表演说，号召他们放弃革命行动一事，作为比约11世的事。接编辑部转来读者冯进毅神父及刘多明先生来信，指出这一错误，特向冯神父及刘先生致谢，并向“广扬”读者致歉。

姚溥



# 正確認識與教廷關係的問題

天津西于庄天主堂本堂神父 孫 駿 德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討論了兩条道路問題，反帝爱国問題、中国天主教与羅馬教廷的关系及中国教会独立自主問題，并在代表們取得認識一致的基础上，通过了決議和其他文件。現在我就中国教会与羅馬教廷关系的問題，談談我的認識。

为了正確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先要弄清楚：  
(1) 教宗職權的限度；(2) 愛祖國的天職；  
(3) 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貌。最后，我們再來看一看羅馬教廷無理否認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的合法職權是否正確的。

## 教宗職權的限度

“要理”上告訴我們，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是聖教會最高的元首。耶穌在世的時候，交給了首任教宗聖伯多祿教會元首的職務，給他說：“我交給你天國的鑰匙。凡你在世上網綁的，在天上也必要網綁；凡你在世上釋放的，在天上也必要釋放。”因此，在每個教友的心目中，教宗占有很高的地位，教宗在教會內享有无上神權，也正因此。

有的教友不分青紅皂白地認為教宗在任何事物上都有最高的權威，盲目地服從；認為不服從教宗就是不服從基督。這種思想的由來是，沒有明白當初耶穌給伯多祿及後世教宗們的職權是什麼。耶穌在世33年之久，唯一目的是救贖人類的靈魂。祂所以建立聖教會并授伯多祿以聖教會首領之職權，是為了繼續祂管理聖教會，救後世人的靈魂。祂所付予伯多祿的，只是為了完成這種職務的相對神權，使他能更好地按照耶穌的意旨管理聖教會。

教宗的神權在聖教會中是至高的，因為他代表的是耶穌。神權以外的一切權柄，尤其是政權，耶穌並沒有交給他。耶穌在世時，曾多次表明過這一點。聖經上記載，耶穌不但為自己，並且為伯多祿納了

稅。耶穌的這種行為足以證明：耶穌不獨自己，而且也願意信仰祂的人，他的教友，完成對國家的義務。神權而外，耶穌不願伯多祿再有什麼特權。耶穌很清楚地劃分了政權與教權，使我們對國家和教會都要完成任務，不可偏於一方：

“責撒肋的歸責撒肋，天主的歸天主”，也就是當給政府的歸政府，當給教會的歸教會。耶穌曾表示過祂對現世的地位不感興趣。在耶穌以五餅二魚的聖迹飽餓了五千人後，眾人欲擁祂為王，祂迴避了。耶穌自己不願意做的，當然也不願意代理祂的人去做。耶穌的所言所行足以說明祂來到世上的目的和建立聖教會的目的，也可以證明祂所交給伯多祿及後世教宗的，只限於管理教會的神權了。如果我們認為教宗既是耶穌的代理、聖教會的元首，在神權之外還享有其他特權，不服從他就是不服從基督，那是不合邏輯的、**“極端錯誤和有害的思想。**

### 愛祖國的天職

“要理問答”卷2第28題：

“對於國家我們有應盡的本分嗎？有。就是當愛護國家，服從合理的

法律，勉盡法定的義務。”故此，愛國家、服從國家的領導，是天主的誠命。聖保祿宗徒也說過：“人人都應當服從政府，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當權者都是天主制定的。所以凡是誰違抗政府，就是違抗天主所建立的秩序，而違抗者給自己招來懲罰……因為他是天主的臣僕，是為你們謀福利的……所以應當服從，不僅是因為畏懼刑罰，也是由於良心。”（羅馬書，十三章，1—7節）我們雖然是教友，但并不因為聖洗聖事而超國籍。法國人領洗後仍是法國人，美國人領洗後仍是美國人，我們領洗後仍是中國人。在關於救靈魂事主的事情上服從羅馬教廷，在屬於政治一類的事情上服從政府。不然便是違反天主的誠命，得罪了天主。

### 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貌

羅馬教宗既是聖教會的元首、普世教徒之公父，對待普世教徒，當一視同仁，不分薄厚，按照吾主耶穌交給他的任務與取權管理好聖教會。但羅馬教宗並沒有忠於他的職責，而超出了他的職權範圍，以他教宗的權威威脅我們的愛國行

勁。這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是與美帝國主義相依為命，反蘇、反共、反人民。1947年8月27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給教宗的信上說：“我願在我的權力範圍內盡力促成各種勢力的協力合作，為世界的精神秩序而鬥爭，為反對共產主義惡勢力的蔓延而鬥爭。為達此目的，我們願意獻出我們全部的物質與精神的力量。”在同一天，教宗立即復函杜魯門說：“請允許我表示無限的歡欣與感謝。閣下與貴國人權保衛者們，神聖教會可以在這方面進行全面合作。”杜魯門反對共產黨，教宗表示歡迎；對於杜魯門獻出全部的物質與精神力量消滅共產黨，教宗表示感謝，並不惜把整個教會投入作賭注，以達到他的政治野心。這種政治上的反動立場不是很明顯了嗎？

教宗是反對新中國的。打着熱愛中國人民的招牌的教廷駐中國第一位代表剛恆毅樞機主教在1956年10月31日會對蔣幫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說：“惟祈仁慈天主，速賜中國大陸光復，並遙祝蔣總統福壽無疆及中華民國萬歲。”我們的國家，有了共產黨的領導，才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桎梏，擺脫了貧困，成了繁

榮富強的國家，人們才有了幸福、安樂的日子。我們熱愛共產黨，教廷反對它；我們慶幸我們得了解放，而羅馬教廷“惟祈望仁慈天主速賜大陸光復”；我們唾棄蔣介石，羅馬教廷却“遙祝蔣總統福壽無疆”。它的政治立場正與我們相反，正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在政治方面不脫離它，難道是願意羅馬教廷領導我們與美帝“進行全面合作”以“反對共產主義惡勢力的蔓延”嗎？難道我們願意蔣幫重回大陸，我們再受帝國主義壓迫，再過人剝削人的生活嗎？

在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成立之前，教廷通過信德通訊社，對愛國會進行誣蔑，又以“除通功”、“絕罰”來阻止教友參加這個愛國組織。信德通訊社說我們沒有向教廷報告愛國會的性質。我們知道，愛國會是純政治性組織，不是教會內部的組織，不是修會或修院，羅馬教廷當然無權過問；何況在政治方面我們與教廷走的是兩條敵對的道路，我們就更不應向教廷彙報備案。信德通訊社誣蔑我們愛國會有“不可告人之目的”，而我們的目的，是光明正大的，不怕告訴人。我們是團結全國神長教友，發揚愛國主

义精神，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各项爱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并协助政府贯彻宗教政策。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使教会更纯洁，更巩固。信德通讯社更威胁我们，不准我们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任何组织。我们不否认，我们的爱国会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而且我们认为，爱国会既是教友的政治组织，共产党就有权领导我们。难道我们让资本主义政党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吗？那才是白天见鬼！罗马教廷通过信德通讯社来干涉我们爱国，已经是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约束力。我们对它滥用职权，不能不提出严正抗议。

## 支持上海張代主教的合法

### 職權

上海教区張士琅代主教的当选及取得教区的管理权，完全是根据法典。他的职权是不容否认的。但是教廷否认了張代主教的职权，并授与了“与宗座和平通功的全体司鐸及每一司鐸以特权，其余的人不得授予。”这样看来，張士琅代主教当然不在“和平通功”之数了。那末“和平通功”者又是谁呢？教

廷的信中曾说龔品梅是“最称职的主教”，龔品梅所以“称职”，是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站在与教廷同一的立场，积极反共反人民，替帝国主义效劳。“和平通功”者当然也就是龔品梅之流了。張士琅代主教辛辛苦苦，收拾上海教区残局，扭转了龔品梅反革命集团给上海教区造成的混乱局面，使上海教区教友安心地过宗教生活，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因而教廷撤了他的职务。这问题还不够明显吗？

教宗虽然是立法者，是超法典的，但他不能任意超法典。据神学家唐柯来（Tanqueray）的意见，圣教法典对教宗虽没有强迫能力，但他掌管教会应以法典作准绳，作指导。没有相当的理由不可置法典于不顾。法典权威学者魏氏及布氏也认为，教宗不顾法典或超法典，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根据真实的理由；第二，当为教友灵魂的利益。如缺乏这两个条件，超法典之措施即归无效。这种意见是经教会认可的。教宗在处理張代主教的问题上，不顾圣教法典之规定，即缺乏这两个条件。他所根据的理由之一是，上海張代主教是由“爱国人

（下轉第23頁）

# 略談獨立自主問題

天津教區神哲學院神父

王 洗 耳

自從鴉片戰爭直到解放以前百餘年來，中國始終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中。我們中國天主教會，也向來為帝國主義分子把持，不能獨立自主，處在殖民地狀態中。解放以後，我們新中國，在國際地位上成世界第一等強國。我們中國三百万天主教徒，是中國人民一部分。我們必須發揚我們民族自尊心，徹底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實行獨立自主。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我國獨立自主的情況。所以這次在北京召開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全體代表們一致通過了中國天主教會必須獨立自主的決議。這一決議是正確的，因為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主，（1）是符合於聖經教訓的；（2）是符合聖教歷史的；（3）是符合教宗本篤第十五“夫至大”通牒的精神的。

神職人員最大的任務是傳揚天主神國，這是耶穌的聖訓。耶穌向

宗徒們說：“你們往普世，傳佈福音於萬民吧！”宗徒們本着這種精神，往世界各角落傳播福音，隨時隨地造就培養本地神職班，以做自己的繼承人。聖保祿宗徒不但給他們的大弟子第茂德訂下了有關監牧的規律（見第茂德前書第3章），還清楚地向第鐸說明了他要在克勒特建立教會，遴選神職人員的迫切願望：“我留下你在克勒特，使你在那裡完成教會的組織，並依照我以前的命令，在每城內委派長老。”（第后，一，5）這說明耶穌立教會和宗徒們傳教都是要各地的教會獨立自主。

我們打開聖教歷史可以看到，世界各獨立國家的教會都是本地神職人員來掌握。即以日本為例，雖然它允許外國傳教士入境，但只能輔佐日本本地主教辦理教務，而教會大權完全操在日本神職人員手中。外國教士能在他國掌握教權，

除非是在殖民的国家或半殖民的国家，在独立国家是没有的。

1919年，教宗本篤第十五頒发了“夫至大”通牒。通牒上說：“凡管領一區傳教者，其重要先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設之……因本地司鐸与本地人民世籍、天資、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則其能以信德漸摩本地人心……”又說：“然欲本地鐸曹如期望而收功效，第一要务是善于陶鑄，善为造就，但勿当以一种初級粗淺之教課，使仅仅能行司鐸事为已，庶几有成也；必当以充足园滿科目詳尽之教課，一如文明国例当施于司鐸者然。盖筹备本地鐸曹，非令其以較卑之服务輔佐外来之傳教人也，乃令其負荷天主之任命，于管理本籍人民終有一日确能承受之也。”

根据上述，無論从聖經的教訓、教會的历史以及教宗本篤十五世的通牒来看，中国教會都是有权利独立自主的。但是回顧中国的教會，自明朝至解放以前，事实是怎样的呢？絕大多數的教区由外籍傳教士任主教，他們大权在握，不但培养中国神职班，給独立自主創造条件，反而結党营私，把教會变

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这种情况，在过去旧中国时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那时的政权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生存着的，他們欢迎帝国主义不暇，那里还談得到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如此，教會当然就更談不到独立自主了。

今天，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們教會也跟着有了独立自主的条件。我們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容忍教會的殖民地状态，因为那样的状态不但与整个国家的独立的情况极不相称，而且也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教會。这不仅是教會的体面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問題。教會处于殖民地状态，一切都听凭羅馬教廷或外国修会任意干涉，就給帝国主义利用教會进行反动政治活动留了空子。那样一来，不但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时也損害了教會应有的圣洁，不但为六亿人民所不許，也为每一个真正虔誠的神长教友所不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这样一个政治性會議要討論中国天主教會独立自主問題的主要原因。

有人从“独立自主”四个字联  
(下轉第32頁)



# 對社會主義學習的一點體會

北京教區神父 王師德

目前，全國各地人民正在廣泛地進行社會主義學習，辨明大是大非。這個學習的重要意義，在於使全國人民的思想大大提高一步，在思想上過社會主義關。我們天主教人士，當然也不應例外。當然也要在思想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但有人有顧慮，怕參加社會主義學習要改造信仰，這真是笑話。國家和人民向我們要求的是要我們愛國，擁護社會主義，並不要我們放棄信仰；要我們與全國人民步伐一致地，朝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不願意我們掉隊，被關在社會主義的門外。我們雖然沒有象許多右派分子那樣的政治野心，但反躬自問，由於我們思想上過去受到帝國主義毒素影響很深，是否因而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對於共產黨的領導，還存在抗拒的情緒呢？再進一步，是否誠心誠意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並在社會主義的路途上大踏步地前進呢？類此種種情況，正是在這次社會主義學習當中應當詳細檢查和加

以改造的。因而，這次在全國天主教界開展的社會主義學習，是具有偉大的意義的。

我們天主教界的社會主義學習，是以傳達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為先導而展開的，在學習中，主要的是辨明與教廷的關係的問題與兩條道路的問題。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這兩個問題是互相聯繫着的。如果你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要和教廷割斷政治上的聯繫，換句話說，你如不肯和教廷割斷政治上的聯關，你也就不算誠心誠意擁護社會主義道路，因為教廷在政治上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

不錯，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我們應該服從羅馬教廷的領導。這是天主教的特點，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服從教廷領導，不是漫無邊際，不是在任何事務上都服從。尤其在政治上，我們絕對不能聽從羅馬教廷的指示。我們和教廷的聯繫一定要限於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的範圍以內。任何政治上

的联系，都必须干净地断绝，这样才能够保持我们的立场。

有的人太好感情用事，以为提出和教廷割断政治上的联系，是对于教廷的污辱；而完全不想教廷根本不应当干涉我们的政治。难道许它无理地来干涉我国内政，就不许我们提出抗议？这真是岂有此理！如果罗马教廷从来未曾干涉过我们的政治活动，也就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了。恰恰相反，教廷一贯地用各种方式来干涉我们的政治活动，挑拨中国教友和祖国人民的团结。例如1949年教廷发出命令，1950年发出警告，禁止神职人员和教友赞助共产党，不准阅读共产主义书刊，不准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组织；再如最近在今年7月13日，梵蒂冈信德通讯社发出破坏爱会并污蔑人民政府的电讯，妄称爱国会是“消灭教会”的组织，不准我们参加，并要我们“在身体和精神的力量所及的范围内拒绝签名”，不准我们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任何组织，这是明显地干涉我们的政治活动的行为。又如自1951年以来，教廷屡次用“停神功”、“开除通功”等手段来威胁打击爱国的神长教友，再如最近于今年7月10日

无理否认张士琅为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的命令，这都是通过宗教形式来达到它的迫害爱国的神长教友的政治阴谋的。类此干涉我们的政治活动事实，不一而足。明显的破坏，我们容易认清；那些假借宗教形式出现的，需要加以分析以后，才能辨认。今后我们必须提高警觉：对教廷颁布的谕令或指示，必要加以分析，凡是不利于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政治性阴谋，我们当一概拒绝。这是爱国问题，也是立场问题。

不可讳言地，讨论与教廷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烦难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相信真理不怕辩论，能够用冷静的头脑，摒除感情，客观地、全面地、认真研究问题，真理终会出现的。就举最近教廷发布的禁止中国教友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组织的指示来说吧，就有人被吓慌了。当他听到有人表示，这样的指示不能接受时，就呐喊着说：“不听罗马教廷的命令，还算什么天主教？你们神长们都不听教宗的命令了，怎样叫教友来听你们的命？”其实对这样一个问题，满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片面地强调应当听教廷的命令，全不管是什么样的

命令，这就失掉理智了。不问是誰的命令，凡是不正义的，就不应当听，这是原則。难道象这样叫我們抗拒政府的命令，还能說應該听嗎？除非站在反动立場的人，才听这样的命。

圣保祿宗徒說：“一切政权都是从天主来的。誰抗拒政权，就是抗拒天主的秩序。”（羅馬書，十三章，2节）聖經是天主默示的。聖經明令我們服从政府，而教廷現在却叫我們抗拒政府。我們是听聖經呢，还是听教廷的指示呢？神学上有一个原則：凡人为的法律或命令，几时和自然法或天主定的法律相抵触时，人的命令当屬无效。天主十誡第四誡命我們爱国。神学家講解这条誡命时指出：教友当他的国家遭到敌人侵略有灭亡危險的时候，有义务不避身家性命的危險，捍卫他的祖国。这是多末清楚动人的道理。我們如何能随从教廷令我們背叛国家的不正义的指示，而違背天主的誡命呢？

再如，把爱国神职人員开除通功的事件，我們更当用冷靜的头腦来探討了，因为这是在宗教形式下出現的。遇到一个問題发生，首先要研究這項問題的性質，不要光看

它的表面。爱国神职人員受到教廷处以絕罰这件事，如果我們通过審慎考虑，就可以看出，在被罰的一方面，沒有任何可以应当被处罰的罪愆，而只有爱国的表現；再考虑教廷施罰的动机，不难找出它的动机是为了破坏爱国运动。这样就很容易認清事件的实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了。假如不从实質上看問題，單注意事件的外表形式，徬徨然去在法典上找寻出路，不免就要晕头轉向了。因此就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想法：有的說，某某被罰是冤枉的，但應該先接受而后申訴；有的說，这样被罰是毫无道理的，按理不能接受，但是教宗可以无条件收回神权，因此，使用神品权沒問題，可是神权就有疑問了；还有的說：“有罰就有效。”类似这些种种不正确的想法，都是由于光看外表的形式，而不注意問題的实質而来。当然也有个别站在敌对立場別有用心的人，那就另当別論了。

假如認清了問題的实質，一切疑难霎時間都可以雲消霧散。也許有人要問：“罰而无效”的說法，是不是可以在法典上或神学上找到根据？”神学法典都是理性的东西，

为什么不可以找到真理的根据呢？我們打开書本看看。神学家法典学家講論絕罰，都一致指出：“致罰的原因是罪”，大家有一个原則：“无罪即无罰”；并且指出，这个罪还須是一个重大的罪，不然，罰即不能成立。法律家講解“无罪即无罰”的原則时并說：不單在确实沒有罪时，即使在不能合法証明有罪时，也認為沒有受罰的原因，罰即属于无效。仅根据这一点，那認為“有罰就有效”的說法，就完全站不住脚步了。

主張先接受而后申訴的說法，也是自相矛盾的。法典上的申訴形式，是为有疑难的情况时使用的，如果情况是明明白白沒有罪，还何必要走申訴的形式？况且教廷降罰的出发点是为了打击爱国行动，即便申訴又有何益呢？至于那認為神品权无問題，而只忧虑神权有問題

的看法，也是不通的。行圣事的权力的剝夺，是随着出通功的罰而附带来的影响，在“无罪即无罰”的原則下，罰既然已經不存在了，那末还有何理由顧慮那个由罰附带来影响会成立呢？

以上的例子，不过用來說明，在任何煩难的問題上，只要我們認真地去追究真理，自不难得出正确的結論来。但是，最要紧的是立場問題。不先站穩了爱国的立場，那末就难免发生偏見了。

全国各省市的天主教界的社会主义学习，有的地区即將开始，有些地区已經开始了。希望大家都本着爱国爱教的精神，兴奋地、热烈地进行学习討論，从而使我們認清兩条道路和与教廷关系的問題，使我們的思想真正得到提高，好能和全国人民一道来建設我們的祖国，更好地能独立自主地办好我們的教会。

（上接第17頁）

民委员会”选出的，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張代主教是由上海教区諮議会在圣体跟前自由选举的。其次，教廷这样做对上海教友的灵魂沒有利益，甚而有害。故此教廷否認張代主教的措施是无效的。我們坚决反

对教廷不顧上海教区灵魂的措施，我們要向教廷提出严重的抗議。

我們支持張代主教的合法职权，支持大会決議，坚决与羅馬教廷割断政治、經濟上的关系，不容許羅馬教廷利用宗教达到它的政治陰謀！

# 該怎樣過將臨聖時



## 講道台

天津教區神父

李德培

1957年的聖誕節即將來到，為能过好聖誕佳節，按普聖教會的習慣，必須經過一個準備階段，“將臨聖時”（Adventus）。聖教會的年曆，以將臨聖時開始，以聖神降臨第末（24）主日終了，故將臨第一主日就等於是聖教會礼仪的元旦。將臨聖時包括四個主日，就是聖誕節前的四個主日。它的來歷，聖教史書上沒有詳細系統的記載，但據吾人推測，早在聖教初期，已經開始施行。公元380年在撒拉高扎（Saragossa）舉行的區議會。第四項決議：從12月17日起，到三王來朝（1月6日）止，眾信友必須參加聖堂的禮節。公元650年將臨聖時普遍地在西班牙遵守五個主日，其後有些區議會規定了聖時內當守的大小齋，有些區議會規定了聖時內不得舉行婚禮等項，這樣漸漸形成了聖教會守將臨聖時的禮規。

該怎樣過將臨聖時？聖保宗徒

在將臨第一主日的彌撒書信上提醒我們說：“兄弟們，現在已是應當從睡夢中清醒的時候了，救贖之恩已臨近了；暮夜將闌，白晝即到，我們要拋開一切黑暗的行為，帶上光明的武器；不可饕餮酗酒，不可縱情淫樂，不可爭殺妒恨；但要穿上主耶穌基督。”（致羅馬書，拾叁，11）主的前驅聖若翰保弟斯大更深刻具體地教導我們該怎樣作準備，迎接耶穌，說：“你們當預備修建主的道路：凡溝壑要填起，丘陵要剷削，彎曲處要取直，崎嶇處要鋪平。萬民即將看到主的救贖。”（路加，叁，4）我們過占禮日的時節，外面的點綴裝璜，固然也是不可免的，比如把聖堂裝飾得堂皇美麗，穿上節日的新衣，安排一些比較豐滿的餐飯，大家歡樂，以表達喜慶的氣氛。但按照聖保祿的教訓，內心的準備是更要緊的。就是要我們棄暗投明，洗心革面地痛改前非，積極行善立功，脫去舊人

而換成新人，把心靈修治得清浩美麗地迎接救主耶穌的來臨。聖人若翰囑咐我們的是：第一，要充填溝壑：凡我們所有缺本分的地方，就是阻礙主途的溝壑。我們必須以功勞德行作瀝青砂石，把溝壑谷壑的缺欠填平，修補成主的康庄大道。第二，要剷除丘陵：罪惡的根源，毛病的養成，都是高山峻嶺，壅塞主途。我們必須以守齋克苦的工夫，節制情欲，拔除罪根，為主鋪平道路。第三，彎曲的要修直；人心險惡，爾虞我詐，猶如羊腸鳥道，不易通行；我們要以忠誠正直作斧鉞，為主修直心路，歡迎主的降來。吾主耶穌是萬善之根，諸樂之源，我們惟有虛心虔誠才能承受耶穌更丰滿的恩寵。

我們大家都知道，天主十誡總地歸為兩條，愛天主和愛人。而在第四誡孝敬父母之內更包括着愛祖國、愛人民的本分；人若是不愛祖國，也就等於不愛天主。聖若望宗徒說過：“空言愛天主，而不實行愛人者，就是扯謊。”（若望一書，肆，20）我們愛祖國不但是本性的天職，且也是超性的本分，同樣是立超性功勞的行為。故此在將臨聖時準備过好聖誕節的當兒，也

很需要把愛國的本分檢察一下。

自解放以來，我們的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領導下，已經走上了獨立富強的道路，給剝削階級宣判了死刑，結束了幾千年來貧窮落后的狀態；通過反帝鬥爭，擺脫了近百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現時在國內外形勢好轉的情況下，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勝利而超額完成，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安定，社會風氣改善，道德日益提高，減少了消滅了多少犯罪的機會。憲法中又規定了人民信仰自由的權利。這一切和我們聖教會的公道、博愛精神是完全符合的。我們天主教友，身為中國人民，親眼看到新中國的光明前途，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以及多年理想不到的已變為今天的事實，本着我們的良心和天主的誠命，怎能不愛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呢？

但是不可諱言的，我們教會內倘有部分人士，在愛國道路上徘徊猶豫，遲遲不進，或竟然對政府持對抗態度。這些人是否就是聖保祿說的那些不願意棄暗投明的人，或者也就是聖若翰所說的那些心中有溝



丘陵、弯曲不直的人？我認为封建残余思想、帝国主义种下的毒素与对羅馬教廷頒佈的那些不叫我們愛祖国反动不合理的命令，而硬要盲目地服从，就是他們心中的丘陵。“五不”政策——不听、不說、不問、不願参加学习、不积极参加祖国建設，甚而表现出厭世悲觀，事事消极的态度，这就是他們心中的溝壑。工作上躲重就輕，学习时蒙混过关，虚情假意，伪善欺人，不正直，不老实，如同耶穌責斥法利塞人說的，他們是塗了白堊的坟墓，外面洁白而內里惡臭；这些就是他們心中不直之处。希望这些人睜开他們的眼睛，扩大个人的視野，看看全国人民和全国三百万教友全在搞什么。你們一小撮人的螳臂不但擋不住車，只有自取灭亡——得罪了人，也得罪了天主。希望这些

人要加强个人政治和教义的学习，能够幡然觉悟，認清什么是政治，什么是宗教，宗教和政治必須分开。

肯定地說，爱国、愛教和守天主的誠命是一致的。有了富强的祖国，才能广揚教会，圣教会广揚了，才能过好宗教生活，才能談救灵升天大事。非洲帝国主义殖民地境內教会的衰灭，是我們很好的一个教訓。只有因爱国而成圣人的，絕沒有为叛国而成圣人的。我們要同圣保祿宗徒一齐呼喚：“时候到了，我們从睡夢清醒过来吧！”帝国主义的“黑暗”时期已經过去了，中国天主教会的“白晝”已来到面前了。我們坚决要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划清界限，辨明是非，分清敌我，扫除一切爱国愛教的障碍，善尽一切爱国愛教的本分，守好天主的誠命，好好預备过1957年的聖誕占礼。

“在苏联，政教是分立的。但是，你們也許知道，我国有許多教会，而且它們只要不干預国家政治生活，就都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如果教会的神职人員們要利用他們的宗教活动来进行反动苏維埃制度的政治宣傳，那就是違反我国宪法的行为。苏联人民也不会讓教会这样干涉自己国家的事。”

——摘自苏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于1957年11月22日答美国記者康西丁問

#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 湖北省傳達學習會議正式開幕

湖北省天主教友傳達學習會於10月30日上午在武昌正式開幕。參加會議的有湖北省11個教區的神職人員和修道教友150餘人。

首先由武漢市愛國會副主委彭堅教友講了籌備會議的經過後，提出主席團名單，全體一致通過易宣化（主席）、張鳴謙、彭堅（副主席）及李道南、董光清、陳光祖等19人為主席團。

繼由易宣化主教致開幕詞。他說，這次會議是在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第一次常委會議的決議指導下，在全省出席北京會議的代表共同努力下，得到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處的大力支持與協助而召開的。會議的內容以傳達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及決議為主。

接着李道南主教代表湖北省出

席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全體代表講了話。

在自由發言中有神長代表彭澤生、修道代表汪博仁、教友代表李世仁等先後講了話。他們一致指出學習的重要，並保證在學習中遵守會議制度和紀律，有信心有決心地把學習搞好。

武漢市愛國會主委袁文華神父代表武漢市全體教友，漢口總主教區董光清代主教代表三個教區的神職人員先後講了話。

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周杰、湖北省人委會史林峰副秘書長、中共湖北省委統戰部麻佩三秘書長、武漢市宗教事務處張立業處長、湖北省宗教事務處葉雲處長等都先後講了話，號召神長教友好好學習。最後，由隨縣教區宗座總理陳光祖代

表全体参加学习的神长教友们致答詞。

下午，由出席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代表左維斗神父向全体学

員有系統地傳達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和內容。傳達后即开始討論。（刘国政）

## 參加湖南省傳達會議的神長教友

# 駁斥張愨的反動言行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湖南省傳達會議已經开了一个多月。当絕大多數神职人員和所有到会教友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代表會議各項決議时，衡阳教区代理主教張愨曾公开反对中国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并为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內政的罪行进行辯护。他們这些反动言行，遭到了与会人員的坚决駁斥。張愨在理屈詞穷的情况下，已完全陷于孤立，他开始承認自己的錯誤。

張愨的錯誤观点，表現在关于爱国会問題上。大家認為，爱国会是天主教友爱国爱教的政治性的群众团体，不是教会組織，教廷是完全无权过問的。所以教廷絲毫也不能干涉各国教友的政治生活。至于梵蒂岡作为一个国家來說，它更无

权管理別国的人民；中国天主教友不能因为信奉了天主教，而必須与梵蒂岡保持非宗教性的对系。可是，張愨却避开这些問題，硬說參加天主教爱国会的既是神父教友，它就具有了宗教的性質，如果不得到教廷的許可就成立，便是帶有裂教的危險。他認為教廷有权干預爱国会，認為成立爱国会要报教廷批准，說“政府認為爱国会是合法組織，教会不能認為是合法組織，因为它沒有經教宗批准。”至于已參加爱国会的人是否应受“弃絕”的問題，他認為要以教廷的命令为轉移，如果教廷不准參加爱国会，則參加爱国会的人应受处罰。

在討論中，大家列举的很多事实，揭露了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說明教廷如何緊緊地追隨帝国主

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充当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而張愨却不顧这些事实，否認教廷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公开为教廷的罪行辯护，甚至把教廷的一切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以及敌視我国的种种罪行，說成是“为了维护教徒的信仰”。大家提出要坚决和教廷割断政治、經濟联系，張愨則叫囂不能宣布割断政治、經濟联系，否則，就是所謂“裂教”等等。

張愨的这些反动謬論，激起了神职人員和教友的普遍憤怒，紛紛向他展开了义正詞严的質詢和駁斥。常德教区神父熊亮夫說：“我們教会不是建立在空中，在沙漠中，而是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爱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天主教友也是人民一分子，当然不能例外。我們要爱共产党領導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个国家是确实确实值得爱的。上面这些道理，已經被大家講得清清楚楚，这里决不容許任何人用宗教的幌子来誘惑我們不爱自己的祖国，更不管帝国主义喜不喜欢、同不同意，我們这个神圣权利是不容許任何人干涉的。”平江神父夏蔭在闡述了爱国会的性質、任务后，憤怒地指出：“那些

說成立爱国会要教廷批准的人，是失掉了中国人的气味。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天主教300万教友也是不会容許的。”因为参加爱国会而受到教廷的絕罰，应不應該接受呢？大家認為，爱国无罪，无罪就不应受罰。教廷无理“絕罰”爱国的中国神职人員的作法，是政治阴謀，实質上就是干涉我国內政，坚决不能接受。衡阳教区神父郭則謙說：“爱国是正义行为，不仅无罪，而且有功，梵蒂岡的絕罰違反正义、違反真理，因此，應該置之不理。”

大家还一致斥責了教廷一貫敌視我国等罪行，認識到教廷不仅仅在我国解放前就曾长期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而且在解放后仍然力圖繼續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帝国主义破坏我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工具。例如几年来教廷利用宗教名义就发出了好多次反动“通諭”和号召，如1951年至1952年的“为中国联合祈禱运动”，1952年1月18日的“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諭”等，其目的就在于破坏新中国，煽动中国天主教友反对人民政府，抗拒政府的政策法令。張愨在否認教廷是帝国主

义侵略工具的詭辯中，曾反复強調“梵蒂岡是个神国，它沒有掠夺別人，沒有意思要推翻別人的政治制度。”零陵神父李震林就以具体事实粉碎了这种詭辯。他指出教廷在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期間，在短短的十几天內，連續发表了3个通諭和一次广播演說，号召全世界所有教徒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李震林还說：“教廷对中国人民也是一样的仇視，当伪滿洲国成立时，教廷立即承認了滿洲国；解放后，教廷指使黎培里向中国天主教会发表敌視人民政府的反动命令，不准中国天主教友参加爱国会，不

准閱讀共产党出版的書籍和报刊，不許参加工会、妇联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組織，这完全暴露了教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反动面目。”岳阳教区神父王子澄，在大量揭露了教廷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工具的事实后，說：“不与教廷割断政治、經濟关系，我們便会变成它的反共政治資本，便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經過大家摆事实，講道理，进行爭辯以后，張愨已初步交代了他的反动言行，目前，群众还要他繼續进行深入檢查，彻底交代。

## 貴州省天主教人士座談會勝利結束

會議通過擁護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和支持上海教區代理主教張士珉的信。

貴州省天主教人士座談會历时25天，于11月2日胜利結束。會議期間全体与会人員認真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习仲勳秘書長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會議同时听取了貴州省宗教事务处

王保生处長的講話和出席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貴州代表关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精神的傳達。會議深刻地討論了兩条道路問題；并貫徹了反右派斗争的精神，着重地討論了中国天主教会与羅馬教廷的关系，經過大会和小组認真严肃的研究和辯論，达到了思想認

識上的一致。會議最后通过了“貴州省天主教人士座談会关于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和“貴州省天主教人士座談会关于支持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的信”。決議指出：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各項決議，正确地代表了我們的共同意志，我們表示完全拥护，并坚决而忠实地貫徹执行，把反帝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一步。決議又說，會議一致認為：爱国是人民的天职。我們为了爱国爱教必須坚定不移地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決議指出：梵蒂岡一貫反苏、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为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梵蒂岡不仅在解放前就长期利用中国天主教会作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工具，而且在解放后仍然企圖繼續利用中国天主教作为帝国主义反对我們社会主义事业的工具。梵蒂岡承認台灣蔣介石政权；并指使和支持暗藏在教会內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对我国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这种利用宗教进行反动活动，干涉我国內政，侵犯我国主权，侵犯我們純正的宗教信仰的罪惡活动，激起了我們无比的憤

慨。我們絕不能容忍！我們要坚决同梵蒂岡划清政治上的界限，割断一切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关系。

決議指出：中国天主教会必須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只有在梵蒂岡尊重中国主权，尊重中国天主教会在宗教上应有的权利，并且有利于我們教务的条件下，才能与梵蒂岡建立一定的宗教关系。

教会內的右派分子彭拯华、朱稼陆、伍光华等，經与会人員彻底揭露批判之后，在无可辯駁的鉄的事实面前，分別在会上向大家交代其反动言行，表示願意重新做人。

11月2日會議結束的当天晚上，政府举行宴会，招待全体与会人員。省委统战部惠世如副部长参加了宴会，并在会上講話。他首先向大家祝賀座談会的胜利，祝賀天主教爱国运动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他希望中国天主教友会朝着明确的方向繼續开展爱国爱教工作。最后他着重地說，时代是不断地往前发展的，希望中国天主教人士和全国人民一起，跟着时代巨輪一道前进，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的祖国。（黃明亮）



## 各地傳達簡訊

**湖北老河口** 湖北老河口教区总堂神长、修道、教友等，自8月23日听了艾伯鏞神父传达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精神及决议后，即进入学习、讨论阶段。学习中，神职人员对中国天主教的自办问题，关于中国天主教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都一致认为，凡属天主教教规教义的纯宗教信仰问题，应当服从教宗的领导；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应当与教廷一刀两断，脱离联系；并一致声明，教廷企图利用宗教形式干涉中国内政，阻碍教友反

帝爱国行动，决不能接受。9月28日学习告一段落。10月24日，老河口总堂神父10人，修女曾昭普、刘泽民、张贤文、黎明辉、李辉雪等7人，教友郭夫之、魏煥子等6人去武汉参加湖北省传达会议。（施润民）

**新乡** 河南省新乡市，从9月3日至13日，举行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的人员有：神长、修女和教友共计33人。座谈会上，由出席北京会议的代表刘仁平及卫辉教区副主教武宪成传达了大会情况，然后通过分组讨论、大会发言，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尚有极个别的少数人思想模糊，界限不清。今后仍将进一步开展学习。（李仲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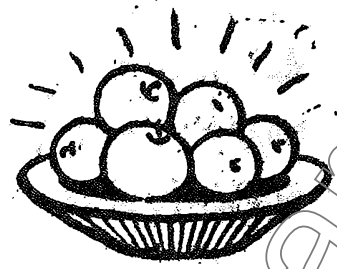
（上接第19版）

想到“裂教”。这当然是不正确的。所谓“裂教”，是指某地教会或某一个人对教宗以耶稣代表的身分所宣布的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不信不守而言。我们所要求的独立自主，丝毫没有这样的意思在内。我们所要求的独立自主，主要的是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与奴役，并不是另搞一个天主教，或者另立一套教义教规；因此，北京大会的决

议中特别指出，我们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有了这一点，就是不裂教的最好说明。因此，恐怕“裂教”的顾虑是完全多余的、不必要的。

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既无碍于信仰，同时又是适应国家地位、改变中国教会百余年来的不正常的状态的好事。一举数得，何乐不为？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 金蘋果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箴言：XXV 11。

學習雜感

岳樹德

## 誰說教廷反對帝國主義？

有人說教廷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今举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实来证明这种說法的荒謬。

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間对天主教的暴行及教廷当时所持的态度为例：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华北时，杀死正定教区主教、神父共六、七人之多。

1939年，献县教区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迫害。他們硬說有人从献县張庄大堂上往外打信号槍，借这个詞儿，捕去了神父、修士、修

女、教友很多，其中20人被杀害。1941年，修士們到献县教区坎地的菜园子里去玩，园子外面响了兩顆手榴彈。日寇又借这个詞儿捕去了神父、修士、修女、教友共三、四百人之多。过了几个月，又有20个被杀害了。

日本帝国主义者如此殘暴地屠杀中国神长教友，可是身为教廷驻华代表的蔡宁却叫我們“守中立”，不許我們参加抗战。后来，教廷又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嗎？

## 所謂“愛國的一個方式”

有人說：“教宗只是不讓人参加爱国会，并没有說不讓人爱国。参加爱国会不过是爱国的一个方式，不参加也不見得就是不要国。”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邏輯！如果照這種邏輯推下去，聖洗聖事也不過是得神恩的“一個方式”，不領聖洗也就可以得神恩了；吃飯也不過是維持生命的“一個方式”，不吃飯也就可以活着了。

教宗反對社會主義，歷史事實多得很，不能一一列舉。解放以來，他屢次下命令不讓我們接近共產黨，不讓我們參加愛國會，更對

愛國的神長教友用各種方式進行打擊迫害，不是很明顯地說明他不許我們愛國嗎？當然，他不能明目張膽地說“不許你們愛國”，因為他也知道那樣做太明顯了，而愛國又是天主的誠命，所以有的時候還用一些“鼓勵”愛國的詞句掩人耳目。事實上，他就是不讓我們愛國，讓我們都走龔品梅的叛國的道路。

## 是光榮，還是恥辱，

有些人常常“不忘當年勇”，一來就說從前天主教如何如何，仿佛從前的那些都是“光榮史”似的。

我現在僅舉幾件小事為例：

(1) 在清朝時，河北省南皮縣某地因爭水利而挑起了一場幾個村聯合起來的械鬥，有的村中有人說：“今年過年咱們全村都不貼對子，全奉教，明年打官司就打贏了！”

(2) 河北省靜海縣管鋪頭村，從前有一位“吳三爺”，是當地一霸，因為他背後有兩個法國神父支持他。庚子後，他帶領手下的流氓打死了一個人。縣官到那里去

驗屍，路過他家沒有下轎去拜他，他就唆使打手攔路大罵縣官，結果還是縣官給他道歉了事。

(3) 京東某地有一位萬神父（外國人），他每次出外給教友送聖體，路上遇到他的人，不論奉教不奉教，都得跪下，不然就挨嘴巴。

這些仗勢欺人、橫不講理的事，是“光榮”嗎？我以為這正是恥辱，正是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在中國人民心中種下的仇恨的種子。無怪在解放後有一位老會長對我說：“若不是宗教政策的保護，人家要報仇的呀！”

# 教廷對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的 陰謀破壞活動

· 本刊資料室輯 ·

羅馬教廷  
的反動  
政治面目

## 對 蘇 聯

1917年11月7日，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蘇維埃共和國。1918年，帝國主義發動了武裝干涉蘇聯的活動，企圖扼殺世界上第一個蘇維埃政權，教廷即積極參與布置武裝干涉。當時的教宗本篤15世駐波蘭華沙的代表阿·奇爾·拉帝樞機主教（即後來的比約11世）於1918—1920年間，成立了陰謀活動的中心。波蘭反動集團伙同英、法、美的代表就在他那裏製造反蘇陰謀。教廷在支持武裝干涉的同時，並指示住在蘇聯境內的天主教主神父多方面進行反抗蘇維埃政權，並利用教會進行反革命活動。

1929—31年，正當英美帝國主義者發動又一次反蘇高潮的時候，教廷領導了有名的“反蘇十字軍”，企圖恢復對蘇聯的武裝干涉。比約

11世規定舉行反蘇的特別祈禱，號召全世界參加遠征社會主義國家的“十字軍”，並答應給它的所有參加者赦罪。教宗的號召在許多國家里的各種宗教的反動高級教士中間獲得響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教廷設立了一個叫“俄羅斯問題研究班”的特務組織，由法籍主教戴烈吉和奧地利神父施越格主持，專門訓練可以在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間諜人員。這個機關訓練出來的間諜當中，曾有一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隨着德國軍隊一同進入被占領的蘇聯地區，在傳教的偽裝下協助德軍占領。今天這個機關已經變成一個反蘇、反共、反人民民主國家的間諜中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大批天主教傳教士，特別是教會的上層分子，在蘇聯的白俄羅斯、烏克

蘭和立陶宛等地，與德國占領者合作，幫助德國匪徒們加害共產黨員及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們。

1949年，在梵蒂岡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決定愈益加強反對民主及和平陣營的活動，特別是反對蘇聯的誹謗運動。在這次會議之後不久，教宗比約12世發布了一道命令：把支持共產黨爭取和平及國際安全的鬥爭的教徒一律逐出教會。

1952年，教宗比約12世於7月23日，以三萬五千字長函，警告全體蘇聯人民。函中對社會主義蘇聯極盡其造謠污蔑之能事，攻擊共產主義是“賜與人民的無非是痛苦艱辛，因為它剝奪人權，蔑視人性尊嚴和公民權利”。該長函並在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上披露，以配合美帝國主義製造世界緊張局勢的實力政策，作惡毒的反蘇宣傳。

## 對 匈 牙 利

1944年10月，蘇軍解放了匈牙利東部；12月，匈牙利各政黨在共產黨倡議下，組織民族獨立陣綫，並於22日成立臨時政府。1945年，匈牙利主教明曾蒂即開始組織保皇黨，力圖使戰前統治匈牙利人民的

哈布斯堡王朝復辟。明曾蒂赴梵蒂岡，教廷代理國務卿孟提尼主教交給他三萬美元，供他組織反人民的陰謀。

1946年1月，匈牙利宣告廢除帝制，成立共和國。這時已被提升為總主教的明曾蒂不承認這個共和國，並在暗中組織推翻共和國的反革命活動。同年2月，正當明曾蒂從事反人民活動最火熱的時候，教廷又提升他為樞機主教。

同年5月，匈牙利政府破獲了一個陰謀復辟帝制的恐怖組織。參加這個組織的，主要的是天主教徒，在恐怖分子中也有神父。7月，匈牙利政府又取締了策動復辟帝制的匈牙利天主教學生聯盟。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是與明曾蒂保持有聯系的。

1947年1月，匈牙利政府破獲了法西斯組織“匈牙利公社”陰謀案。罪犯們曾準備武裝暴亂，推翻共和國，恢復戰前實際執政的霍爾蒂法西斯政權。這一反動組織曾獲得英美帝國主義者的大力支持，並廣泛地利用天主教會，勾結天主教神職人員，而一些主持這個陰謀的人與明曾蒂也有著勾結。

這年夏季，明曾蒂在赴加拿大

与美国的途中，曾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修道院里，同哈布斯堡王朝的代表奥托·哈布斯堡秘密会商。据明曾蒂被捕后供认，在这次会商中曾约好由明曾蒂负责领导匈牙利保皇党阴谋分子。这个协议是在斯塔尔曼的参加下达成的。阴谋分子曾筹划在帝国主义军队进攻匈牙利领土后，由明曾蒂任国家元首，把共和国淹没在血泊里而恢复王权。参与这一阴谋的有匈牙利的刽子手海軍上將霍尔蒂和前奥地利女皇季塔（明曾蒂在加拿大和她会过面）；教会中的上层人物，除斯塔尔曼外，还有奥地利总主教因尼彻和罗拉赫，以及巴伐利亚的枢机主教发乌哈伯。

1948年3月，匈牙利人民庆祝1848年革命（匈牙利人民在科树特和裴多菲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对封建、反对奥国统治和争取自由独立的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以明曾蒂为首的集团，却发表了诬蔑这次革命的偉大活动家的牧函。5日，比約12世向匈牙利人民发表广播演说，号召他们发动反民主、反共“十字軍”，对人民民主制度作斗争。6月16日，匈牙利議會批准了將教会学校移交国家接办的法案。盤踞

在天主教会及其团体内的反动分子阴谋利用学校问题来煽动教徒起来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由于教会学校中一万四千个教員拥护国家的这一措施，这一阴谋并未得逞。同年12月末，匈牙利政府逮捕了明曾蒂和其他几个天主教反动分子。在主教府地窖的的金属檔案箱內查获明曾蒂写給英美駐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代表的信件：明曾蒂曾敦促西方列强干涉匈牙利內政，把通过神父搜集到的有关匈牙利经济与政治生活的情报供給美国外交使团。为此，他得到了十四万一千美元。教廷也供給明曾蒂大批經費，供他进行反匈牙利政府的阴谋活动。

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发生。10月28日，比約12世发布了干涉匈牙利內政的第一次通諭，号召资本主义复辟，使资产阶级專政的“国家秩序恢复安宁”，并且夢想反革命势力在匈牙利以及东欧其他各国获得所謂“正义之凱旋”。29—30日，反革命势力的霍尔蒂首腦把明曾蒂推出来作为一个“超党派”的人物，作为一个能够动员天主教会的領袖，并公开鼓励組織“明曾蒂政权”，并把明曾蒂从監禁中釋放出来。



11月1日，比約12世頒布了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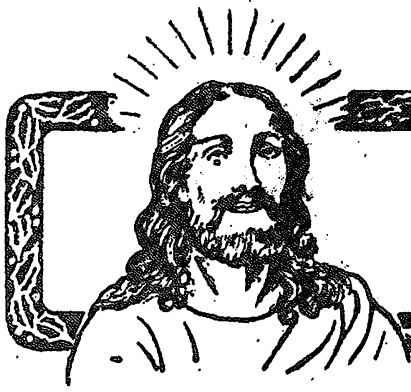
涉匈牙利內政的第二次通諭，为反革命势力打气。当时匈牙利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命死在旦夕，教宗的通諭中流露出得意忘形的姿态說，匈牙利反革命复辟“似乎亦目前在望”。3日，明會蒂在布达佩斯电台公开发表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政綱，宣布要恢复的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

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工农革命政府宣布成立，依靠苏联军队的援助，粉碎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所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明會蒂亡命到美国駐布达佩斯使館，逃避人民的制裁。明會蒂便从美国使館发出反动“指示”，要撤换教会中爱国人士的职务。11月5日，教廷看到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被摧殘，大失所望。比約12世发布了干涉匈牙利內政的第三次通諭，文中充分流露了沮丧的情况，对苏联的出兵支援則肆意污蔑，并号召全世界天主教徒为匈牙利的反

革命分子而戰。

反革命叛乱被鎮压下去了，取得匈牙利全体人民支持的工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教廷并不甘心它的失敗，仍在处心积虑地干涉匈牙利的內政，1957年7月教廷公議部根据比約12世的指示，又頒发一次命令，无理地禁止匈牙利的神父們参加政治活动，命令說：“無論会士或非会士司鐸，均一例禁止竞选或接受議會議員职，或担任議會其他任何职务”，并且又以“絕罰”的手段相威胁。这是一項純屬政治性的命令，是干涉匈牙利內政、迫害爱国神长的极为露骨的反动措施。在明會蒂組織反革命政府的时候，教廷积极加以支持，而神长拥护工农革命政府的爱国行动，却又遭到教廷蛮横无理的干涉，这都充分地說明了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教廷这一項反动政治命令，已經遭到了匈牙利神长教友們的坚决反对。

**更正** 本刊1957年第20期20頁左欄第1行“信、圣、爱”，应为“信、望、爱”；第40頁左欄第8行“无动如中”，应为“无动于中”；第32頁左欄第7行“不会利”，应为“不会利用”；21期第16頁左欄第18行“来照管理”，应为“来照管”；第19頁左欄倒数第3行“二十儿岁”，应为“二十几岁”；第35頁左欄第19—20行“界世”，应为“世界”。特此更正。



#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張震插圖)

(接上期)相傳耶穌扛的十字架，大約長3.30公尺，寬18公寸，厚8公寸，橫木長約1.60公尺，50公斤左右重。

惡人們為了更能進一步地侮辱耶穌，特求比拉多從監獄內提出兩名罪大惡極的死囚——殺人強盜，陪同耶穌抗着一樣的十字架上山受刑，這是要眾人看出耶穌是因為有罪而被殺的。依撒意先知曾預言

過：“祂——救世主竟被打入罪囚的行列中。”據吾人推測，當時的苦路可能是這樣排列着：羅馬兵百夫長在前開路，耶穌赤足肩負十字架在后相隨，耶穌左右有陪綁的二盜，兵丁們全付武裝，前后兩旁防衛。司祭長、經師、民間長老、法利塞輩及一些百姓簇擁在后，號筒喝道，人聲嘈雜地向刑場進發。

## 188 苦路途中的遭遇

### (1) 跌倒

刑場——加爾瓦略山（又名各爾各大）在耶路撒冷城西北，距總督衙門約一公里之遙。耶路撒冷城中間原有一道山谷，把整個城分為兩半，東有毛利豆山，西有西宛山；中間山谷陡直，山路是用大石塊砌成的130級台階，上下行走，非常困難。而總督衙門是在東邊毛

利豆山，要去西門外加爾瓦略刑場，必須經過山谷，爬上西宛山才能到達。耶穌的苦路，就是要背着重大的十字架，走這樣崎嶇難行的山路。

第一次跌倒，是在距總督衙門不過數十步，下毛利山的時候。當時耶穌已是一夜未曾合眼，更沒有

进过一点饮食；一清早又被人拖来拖去，走遍几个衙门；何况又受了鞭打和茨冠等等重刑，圣血倾流殆尽，真是疼痛难忍，力尽筋疲了。耶稣背着十字架下山，再加上十字架的重量全集中地压在圣身上，耶稣勉强支持着走出总督衙门，摇摇

## (2) 遇母

建立圣体后，耶稣领着宗徒往山园里去了。圣母也找了一个清静地方，祈主默禱，准备在精神上，与圣子耶稣一起受苦受难。正如今高义人西默盎所说的：“将有利刃，刺透你——圣母瑪利亞的心灵……”（路加，貳，35）当日午夜后大约两点鐘，圣若望匆匆跑来报告圣母，耶稣已被逮捕，送到亞納公署去了。圣母听见之后，当然心痛欲碎。第二天早晨，耶稣在比拉多。黑落得衙门受审的时候，圣母很盼望到耶稣跟前，一看究竟。但因人多拥挤，圣母无法近前；只有在比拉多把耶稣带到庭外，说“请视斯人”的时候，圣母远远望见了耶稣。

比拉多判定了耶稣死刑以后，圣母急欲再见耶稣一面。圣若望就领着圣母及圣妇瑪达肋納等，从小

幌幌地一步一颠，在恶人拳打脚踢的情况下，跌倒在地。据圣师們傳說，耶稣跌倒的光景，圣伤重开，圣血重流，鼻中鲜血如注，牙齿磕碎脱落，三次的跌倒中，这次最为惨重。

路上繞到耶稣赴刑場必要經過的地方，耐心守候。大约午前11点鐘左右，远远听见人声喧嚷，渐渐看到拥拥挤挤的人们，如潮水般地涌向前来。一群如狼似虎的差役兵丁們，擎着武器，带着釘凿，押送着耶稣，好不厉害！恶人們耀武揚威，越加增了圣母的痛苦。但这些凄惨的情况，在圣母眼中，不过一幌就过；因为圣母的心情，只集中在耶稣身上。及至耶稣来到跟前，圣母一见那种惨酷可怜的状态，大大超出圣母想象之外：头戴茨冠，满面血汗唾污，圣身僵僵顫慄，肩負着大十字架，步步有跌倒的危险。耶稣抬头，猛见圣母在前，止住了脚步。母子之間，兩心相照，彼此注視，互相哀怜，說不出心中怎样的酸痛苦楚来。

（本节未完）

#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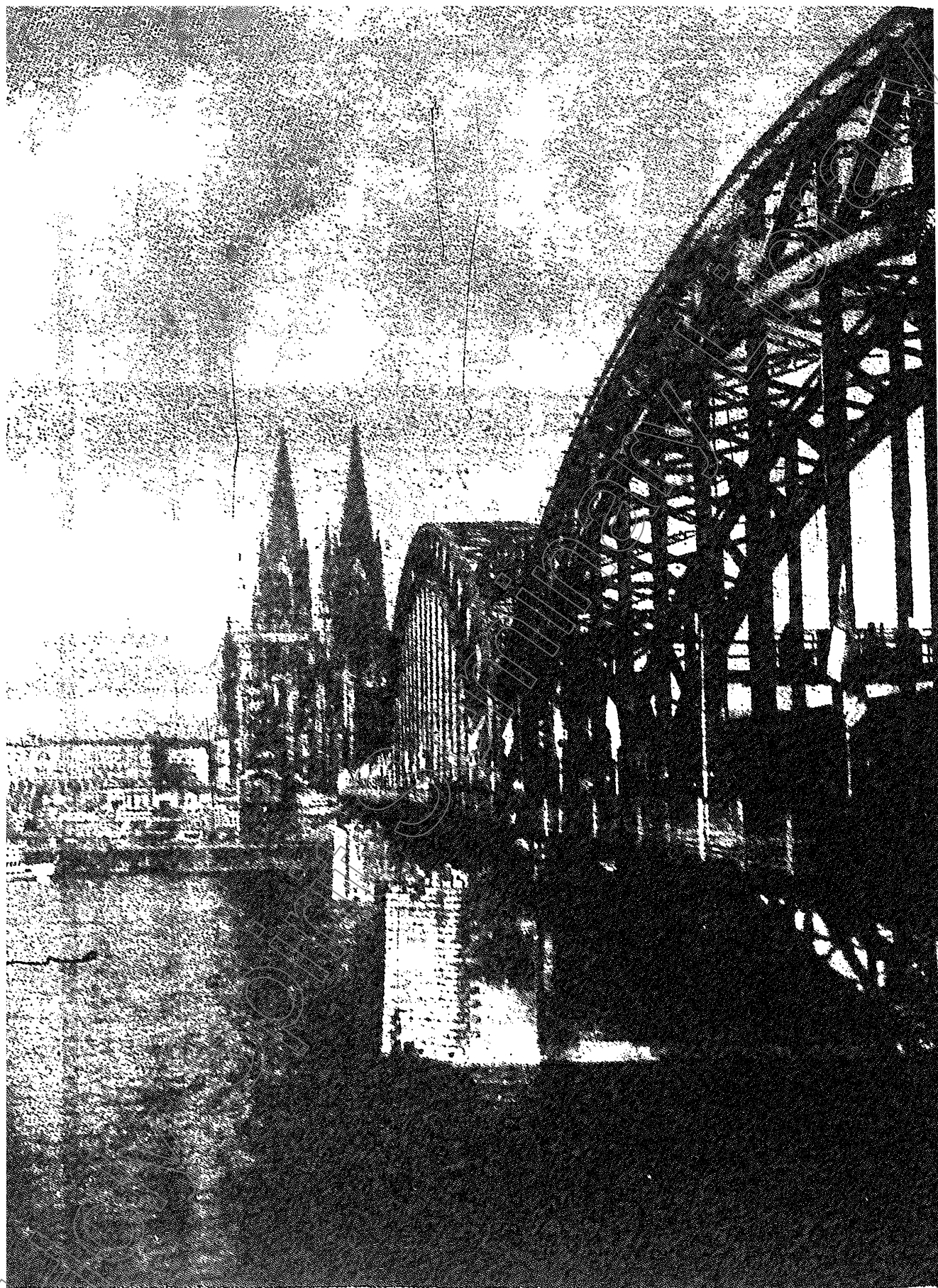
何	若	瑟	(62岁, 天津人)
孟	則	亞	(72岁, 天津人)
孟	若	望	(56岁, 天津人)
甘	保	祿	(53岁, 上海人)
李	依	斯	(85岁, 內蒙叮口人)
鍾	瑪	亞	(85岁, 湖北隕西人)
熊	則	亞	(— 湖南芷江人)

## 周 年

赫	保	祿	陳	若	瑟
馮	瑪	爾	王	瑪	亞
姜	若	望	沈	若	翰
王	若	瑟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從萊因河上遠眺德國科倫城的主教座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